

·创建和初步成绩·

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重建的苏维埃国家机构中没有设立专门的侦察机关，但这并不是说，苏维埃国家没有进行侦察活动。俄罗斯迅速陷入内战，一些其他国家也卷了进来，它们向白匪提供武器和本国基地，甚至直接参与干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将侦察问题摆到议程上来。

据苏维埃侦察史记载，被派往国外执行第一个侦察任务的人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秘密工作人员阿列克谢·弗罗洛维奇·菲利波夫。1918年1月—3月，他几次前往芬兰，调查当地的政治形势和驻扎在芬兰各港口的俄罗斯海军及其位于赫尔辛基司令部——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官兵的情绪。菲利波夫曾是俄国商业报纸《货币报》的发行人和私人钱庄老板。他报告了有关芬兰政府打算中立、俄罗斯海军骚动不安、无政府主义者向当地渗透和芬兰舒茨科尔分子准备攻打维堡军事要塞等重要情报，并说服沙皇海军上将拉兹沃佐夫控制波罗的海海军司令部并转投苏维埃政权。

菲利波夫的许多侦察事例都证明他的国家思维和无可挑剔的情报意识。

在他呈菲·埃·捷尔任斯基亲阅的秘密文件中写道：

在与人民全权代表主席曼涅尔谈过话后，我坚信，

芬兰政府希望严守中立，不采取任何可能招致大国干涉芬兰内政的行动。

德军计划夺取驻芬兰各港口的波罗的海舰队，否则，就是攻占了彼得格勒，德国人也不会取得预想的胜利。必须让每一位驻泊芬兰的海军舰长相信全体起义的重要性，因为德国人只害怕海军。

驻芬兰的俄军处境极其危险。德国打算从北面向彼得格勒施压，并把俄罗斯挤出波罗的海，以便夺取赫尔辛基和维堡的大部分存粮。德国还计划攻占奥兰群岛。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由于缺少必要的材料（染料、钢材、铅、铁、润滑油），波罗的海舰队的舰只几乎没有修理过。另一方面，这些物资却公开由彼得格勒运到芬兰，再由芬兰各港口转运到德国。这种非法交易的中心是彼得格勒“欧洲人”宾馆的咖啡馆，发货点则是古图耶夫斯克岛和连接芬兰铁路的支线。

俄国卢布在芬兰前所未有和不合理的随意贬值给俄国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芬兰低价买进卢布，然后销往德国。此外，俄国向芬兰出口的货物以人为贬值的卢布结算，导致纸币大量流失国外，同时俄国却得不到所需要的芬兰货币。我建议，必须通过俄罗斯国家银行进行所有的结算。

从 1918 年秋天起，各边防特别委员会担负起侦察职能，但只是在邻近地区极有限的范围内。1918 年 12 月 19 日，俄共（布）中央决定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打击陆海军——国内战争中两大主力中的反革命和间谍活动。按照 1919 年 1 月 6

日发布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条例》，特别处组织和领导在国外、列强和白匪占领区的谍报工作。

但时隔不到一年，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不仅在占领区，而且也在一些欧洲城市进行侦察活动，“因为，正如 1919 年 12 月召开的全俄特别处处长会议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国内的反革命活动受国外的领导，白匪的各个中心可以在国外随心所欲地、不间断地、系统地活动。”

只是在 1920 年春天，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才成立了一支特别侦察分队——国外科，并将建立国外特工机关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国外科工作细则规定，苏维埃各驻外代表处必须设立特工机关。只有使团团长知道谁是特工负责人。负责人手下有 1—2 名特工协助工作。在那些没有苏维埃官方代表处的国家，则要派遣国外科的秘密特工，必要时，也把他们派往有“合法”特工机关工作的那些国家。波兰战事爆发前夕，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副处长维·鲁·明仁斯基在 1920 年 2 月 27 日的命令中明确了侦察工作中的反间谍任务：“派反间谍人员到国外，责成他们查明波兰向我后方派遣间谍的所有渠道；越过战线的、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接受向敌人侦察机关渗透的任务。”

因此到 1920 年春天，为逐步满足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实际需求，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人把纯侦察任务从军事侦察工作中分离出来，让其从事现代社会任何发达的侦察机关都在从事的三种侦察活动：公开侦察、秘密侦察和反间谍工作。

但是，仅仅靠文件来开展侦察工作赶不上形势的发展。白匪被击溃后，波兰接着战败。英国的最后通牌迫使苏维埃政府暂停进攻，这使英国、法国和美国得以利用喘息之机向波兰投送武器弹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领导人拒绝了最后通牌后，命令红军向华沙推进。波兰军队进行反扑，攻占了乌克兰西部和白

俄罗斯西部。“毫无疑问，组织谍报侦察工作是我们军事机关中最薄弱的环节，这在波兰战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920年9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一份文件指出，我们盲目进军华沙，遭到惨败。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局势，必须将我们的侦察工作摆到应有的高度。只有认真的、组织得当的侦察工作才能使我们避免轻举妄动……”

为制定侦察机关改组措施，政治局成立了由菲·埃·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德·伊·库尔斯基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全俄肃反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第169号命令。捷尔任斯基1920年12月20日签发的这项命令指出：

1. 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国外科，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

2.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国外科的全体工作人员、所有财产和事务移交给新组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

3. 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服从特别处处长明仁斯基同志领导。

4. 任命达维多夫同志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代处长，他必须在一周内将国外处编制呈报主席团批准。

5. 自本命令发布之时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各处与外国、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外贸人民委员部、中央疏散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一切联系只能通过国外处。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

从该命令签署之时（1920 年 12 月 20 日）起，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侦察机关，即现在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开创了自己的历史。

最初国外处人员不多，组织单纯。该处由一名处长、两名助手、办公室、签证室（当时国外处负责护照和签证工作）、驻外特工机构和国外分支机构组成。

根据第 169 号命令第 4 条，达维多夫被任命为第一任处长。他的真名叫达夫强·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08 年，他在彼得堡被警察逮捕，但被保释，随后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工学院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夫强被德国人关押在拘留营，只是在革命后回到俄国。他参加了内战。后来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多次完成重大任务，其中与红十字会代表团出使法国，解决了俄罗斯军人遣返回国问题。列宁和捷尔任斯基非常了解达夫强。1920 年，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司司长。捷尔任斯基认为，他是担任侦察机关领导人的最佳人选。化名达维多夫（为了保密，因为达夫强的名字外国人非常熟悉）负责该处工作后，同时也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2 年，因被任命为驻立陶宛全权代表而离开侦察机关，从此只在外交系统工作。

莫基廖夫斯基接替达维多夫，短时期担任过国外处处长，后来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塞尔（1922—1930 年）。他也是党的一名老地下工作者，经历过 8 年服苦役和流放生活，内战期间，曾任部队政委和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西伯利亚远东区主席。1918 年，他发生过一件奇事。当时他被匪帮俘虏并要被绞死。在行刑后，发起进攻的游击队员们抢回特里利塞尔，把他从吊着的树枝上解了下来。让游击队员及医生们大为吃惊的是，他竟然还活着。他领导国外处的那些年正是苏联侦察机关形

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打着“别人的旗号”招募人员，因干部短缺而大量吸收侨民进入侦察机关，建立各种独立的间谍小组和使用许多招募的间谍。

特里利塞尔制定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国外分机构（驻外间谍机关）条例》，条例根据现有形势，很自然地确定了主要任务：

在国外进行一切侦察活动的目的是：

- 查明在每一个国家境内从事反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活动的各反革命小组的情况；
- 详细侦察所有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组织；
- 搞清每个国家的政治路线及其经济状况；
- 获取与所有上述工作有关的文件资料。

直到 30 年代末，在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最终停止活动之前，苏联情报机关领导人一直把打击境外反革命，即所谓“白军系统”，当成主要任务。

白俄也没有坐以待毙。在白俄侦察机关间谍活动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奥尔洛夫的档案中，有一份组织对苏维埃政权间谍活动的材料。材料说，内战结束后，侦察中心已经转移到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斯特雷斯基—卡尔洛夫茨镇，侦察机关由米勒、沙季洛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三位将军负责。从 1923 年起，侦察中心和所有白俄组织的领导机关一样都设在巴黎。后来几年，由库捷波夫将军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领导，库捷波夫主要负责破坏活动——组织“针对共产党人”的叛乱和暴动，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领导情报—侦察活动。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材料中接着写道：“哥萨克事务由科拉斯诺夫

将军负责。三人都服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领导。”奥尔洛夫本人负责在欧洲的间谍网及与英国、法国、德国和边境缓冲国（所谓俄罗斯西部邻国）侦察机关的联系。间谍机构每年的经费达 50 600 法郎。

20 年代，国外处（1922 年起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实际上能对所有最活跃的白俄组织——捍卫祖国和自由人民联盟（萨文科夫）、俄罗斯全军联盟、俄罗斯正义兄弟会、国家一劳动联盟——实施间谍渗透，并监控它们与在苏联的间谍联系的渠道。反间谍处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进行的“辛迪加—2”（把萨文科夫诱人俄罗斯）和“托拉斯”（打入无政府组织并把英国间谍西尼·莱利诱人苏联）联合行动已被世人所知，但苏联侦察机关对所谓“白军系统”的其他重大行动则鲜为人知：

——侦察员阿列克谢耶夫小组以莫斯科和哈尔科夫难民身份移民布拉格、利沃夫和巴黎。小组渗透进彼得留拉、斯科罗帕茨基和萨文科夫的组织，提供了它们向俄罗斯派遣密使的情报。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工尼古拉·克罗什科打入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他伪造了共产国际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许多文件）的白俄间谍网领导层，获取了奥尔洛夫的部分档案材料，还提供了有关奥尔洛夫伪造活动的情报。奥尔洛夫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德国当局起诉，并被驱逐出德国（参见“季诺维耶夫的信”）。

——俄罗斯海军前中尉以英国情报部门特工克尔的身份（实际上他是苏联侦察员维克多）前往柏林，通过白俄组织调查反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招募了“俄罗斯正义兄弟会”领导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科里贝格（他也是一名伪造者，专门伪造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签名）。科里贝格以为是替英国人工作（为了钱），可实际上是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工作（参见

“季诺维耶夫的信”。

在高度重视针对“白军系统”工作的同时，国外处也非常关注对外政策（或当时所说的外交）及经济方面的侦察工作，从1925年开始重视科技侦察工作。从事这些侦察活动的，既有随着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建立的“合法”驻外特工机关，也有秘密驻外特工机关。1922年，在德国开设了第一个“合法”机关，即在使馆的合法掩护下活动的机关。德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苏联的国家，从德国便于对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边境缓冲国家进行侦察，所以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的西欧中心，柏林多年来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条条秘密渠道从那里通向巴黎、维也纳、伦敦、罗马。

20年代初，驻柏林特工机关获取了许多珍贵的情报：

——有关西欧各国热那亚会议立场的情况；

——彼得留拉破坏欧洲各国统治集团承认苏联的意图的计划；

——阿瓦洛夫军一小撮白军军官准备暗杀热那亚会议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成员的情况（截获了彼得留拉分子给最高君主委员会的情报）；

——萨文科夫企图冒名古连格·沃兹诺维奇，借负责保卫圣玛格丽塔（热那亚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之机，谋杀列宁的情况；

——德国警察针对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活动情况；

——法国情报机关在克龙施塔特的活动情况。

20年代中期，西欧各国相继承认苏联，这为国家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同时，苏联国际地位的改变也促成了在西欧各国开设“合法”的驻外特工机关。当时隶属于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国外处发生了变化——它的机构变复杂了。为便于领导各驻外间谍机

关，特里利塞尔亲自负责的国外分支机构划出了 6 个区：

——北方区：驻外特工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在哥本哈根、赫尔辛基、雷瓦尔、里加和卢巴瓦设分部；

——波兰区：驻外特工机关设在华沙，分部设在但泽，也在东普鲁士、加里西亚和乌克兰喀尔巴阡地区活动；

——中欧区：驻外特工机关设在柏林，在巴黎、罗马和布鲁塞尔设分部。在伦敦也有驻外特工机关，负责在英国的侦察活动；

——南欧和巴尔干地区：驻外特工机关设在维也纳，在布拉格、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布加勒斯特设分部，在君士坦丁堡的特工机关负责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工作；

——东方区：在土耳其和波斯境内通过高加索全权代表处活动，而从远东共和国针对日本、中国和美国部分地区展开侦察工作；

——美洲区：特工机关设在纽约和蒙特利尔。

虽然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的第一个驻外特工机关从 1924 年起开始在伦敦展开活动，但一些零散证明材料指出，早在 1922 年，国外处就试图向英国派遣特工。侦察机关的档案馆保存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1922 年 9 月 9 日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弗·古比雪夫一封信的复印件，信中谈道：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请您批准任命克拉斯内同志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驻伦敦代表处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他有权招收四名以内的工作人员从事技术工作。克拉斯内同志口头同意奉派伦敦一事。”

现年 45 岁的优素福·雅科夫列维奇·克拉斯内（罗特施塔特）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地下工作经验。同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相识并没有只局限于他们曾同坐在一条板凳上受过审，在尔后的生涯中，

克拉斯内同志成了费利克斯·埃得蒙多维奇的革命战友。显然，他们之间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菲·埃·捷尔任斯卡娅在《光辉的战斗年代》一书中写道，捷尔任斯基曾在她熟悉的克拉斯内家中被捕。捷尔任斯卡娅还写道：“克拉斯内被捕后，警察在那里埋伏了三天。”

党组织的鉴定书丝毫没有提到克拉斯内已经具有侦察工作经验：在派往伦敦之时，他正负责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和红军总参谋部驻维也纳登记处的联合驻外机关。维也纳特工机关除与柏林有组织关系外，还是巴尔干地区侦察工作的基地（见上）。1922年3月27日，克拉斯内在给特里利塞尔的信中写道：“我在巴尔干的机关很大，有可能还想扩大它。一些联系非常有价值，比如，我这儿有个人常到弗兰克尔家，另一个人和克里莫维奇将军——弗兰格尔的情报处长很熟。”

1922年7月，特里利塞尔将克拉斯内召到莫斯科，打算派他前往伦敦。当时没有发现他到过英国的任何材料，但是，1922年10月12日寄自维也纳的一封信提到，他结束在维也纳的事务时，曾向英国大使馆申请过签证。他的妻子——叶连娜·阿道福夫娜·克拉斯纳娅 1925年—1928年负责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英国区，后来的专职工作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由她撰写的有关英国政局的业务材料、总结材料、分析和通报材料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克拉斯内本人因而很快离开了情报机关，转而从事组建波兰共产党档案馆和中央出版社的工作。

· 第一个驻外特工机关 ·

如果说克拉斯内的使命还有些不明确的话，那么情报机关的文献却清楚地记述了其继任者们的活动。1924年夏天，苏联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外处在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设立了第一个驻外特工机关，其负责人是阿列克谢耶夫（奥斯卡尔）。他手下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打字员奥尔洛娃。1925年，拉科夫（沃尔德马尔）接替了阿列克谢耶夫，别洛波爾斯基（马特维）当他的副手。他们俩一直工作到1927年2月。1927年2月到5月，佐洛图斯基任负责人。同年6月，在英国保守政府与苏联断交后，他不得不结束工作，返回莫斯科。

因此，如果用俄罗斯民歌中人们熟知的言词来形容的话，那么，伦敦特工机关20年代3年的历史仅仅是个留有悬念的“开场白”，“正文还在后头”。的确，在负责人频繁更换的情况下，指望短期内开展有效的情报工作是不现实的。

关于伦敦特工机关第一批负责人的情况，除了他们的姓名外，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因此，不可能介绍他们的个人情况。他们在1937年都遭到了迫害。描述特工机关稍微容易些，但仍相当困难——当时没有记录侦察机关特工的个人档案文件，只是从1930年起才开始做这项工作，后来才作为规定明文确定下来。

伦敦特工机关的主要情报员是B—1，也就是《每日先驱报》的记者格尔曼，左派和英国共产党中的知名人士。B—1有自己

的情报员：在外交部，是一名打字员，文件中的代号为“F”在印度部（印度事务部），情报员为“O”；在内务部（内政部）和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Y”、“Z”，及1、2、3、4。他们把B—1当作记者，作为朋友满足了他的请求和委托。文件中没有提到，他们是否知道谁最终得到了他们提供的情报。此外，还有一些情报员——从B—2到B—16，他们是俄罗斯侨民和苏联驻伦敦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人也是侨民）。

或许，《伦敦特工机关1927年1月1日以前的情况报告》是能够全面了解在伦敦工作的惟一有根有据的文献。报告的作者是叶连娜·克拉斯纳娅，她当时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境外分支机构任特派员。

27岁的叶列娜·阿道福夫娜·克拉斯纳娅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她1900年生于克拉科夫一个律师家庭，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专修法语和文学，在伦敦住过一些时间，靠给人讲课谋生，同时学习英语。她天资聪颖，作为校外考生结束了中学课程，于1918年考入克拉科夫大学法律系。191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后积极从事宣传工作，因此遭到警察追捕。在捷克和瑞士坐了3个月牢后被驱逐出境，非法移居到奥地利，后辗转到比利时和德国。叶连娜因为年轻，受过教育，有地下工作经验，受到侦察机关的重用。1921年5月，联共（布）派她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工作。她在国外的第一项使命就是同丈夫克拉斯内一同到维也纳特工机关工作。她在侦察机关比自己的丈夫干得时间长，一直到1929年。根据一些材料记载，特里利塞尔对她评价甚高。1929年1月底，为响应莫斯科市委呼吁有专长的工作人员从事具体工作的号召，她请求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党支部派她到生产部门，当上了印刷厂的排字工。1930年，联共（布）中央动员她参加中国城和普罗斯库罗夫边境地区农业集体化工

作，后来被调到库兹涅茨克斯特罗耶。1934 起，叶连娜·克拉斯纳娅就读于红色教授学院，并投身于文学创作活动。她也和许多忠诚的革命者一样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年代。

在上面提到的关于伦敦特工机关活动的报告中，克拉斯纳娅称，B—1 公开的身份是独立工人党党员，而他本人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确实与英国共产党合作，向党提供有关苏格兰场工作的部分情报，因此，英共中央十分信任他，认为他是一名严肃认真、远见卓识、聪明能干、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叶连娜·克拉斯纳娅接着写道：“他和我们合作的动机是物质利益和追求新闻报道的时效，他还因此得到些提拔，被公认为是机灵小伙。他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圈子，懂政治，善于玩弄外交手腕。”

在谈到 B—1 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外处的交往史时，克拉斯纳娅指出，1921 年，苏联第一个代表团到达伦敦时，开始同他第一次接触。1922 年春，B—1 前往维也纳，结识了当地的特工负责人。克拉斯纳娅掌握这件事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当时维也纳特工机关负责人正是她的丈夫——约瑟夫·克拉斯内。克拉斯纳娅继续写道，1923 年或 1924 年，B—1 访问了莫斯科；给米·阿签字答应完成任务”。显然，指的是 B—1 书面同意同国外处领导人米哈伊尔·阿拉莫维奇·特里利塞尔的国外处合作。

克拉斯纳娅指出，B—1 有不少下线情报员。B—1 和他的小组的情报“大部分都很有价值”，但她也补充说：“在许多情况下，又无处验证他的消息，经常出现三种疑问：

“1. 或许，他的消息是精心编纂出来的报道文章。下述事实也有利于得出这种结论：在最后威胁消除（中断联系的术语）之前，情报员主要提供很难被证实的有关东方的情报，而几乎不报告本国的情况；2. 或许，他是英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对苏联进行挑拨和制造假消息活动的无意或有意的工具。3. 或许（这不合

常规），他希望与我们的情报机关建立良好的关系。”

叶连娜·克拉斯纳娅以她那个年龄少有的惊人的分析能力指出了这名特工活动的积极方面：“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他积极的方面，比如，当石油商鲍里斯·扎伊德（斯坦达尔特安插的人）建议他在《每日先驱报》上报道德特丁与谢列布里亚科夫会谈的消息时，他就此问题征求了罗森戈尔茨和迈斯基的意见，之后拒绝了扎伊德的建议。”

克拉斯纳娅得出最后结论：“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但可以认定，该情报员是伦敦特工机关最优秀的情报员之一。”

B—1 的下线情报员除了在外交部的“F”和印度事务部的“O”，之外，克拉斯纳娅也将外交部高级官员韦勒特和格雷戈尔称为 B—1 获取情报的渠道。

非常有意思的是，B—1 也用他的下线第 1、2 和 4 号情报员完成特工机关下达的对白俄和苏联侦察机关感兴趣的其他人士进行户外监视的任务。

伦敦特工机关的所有情报员的月酬金约为 25—60 英镑。

克拉斯纳娅抱怨“伦敦的外交（政治的一作者注）情报最大的不足是缺少文件资料，因此经常不得不担心获得的是假情报”，但还是肯定了它的时效性和轰动性。她写道：“一个例子是，伦敦比其他情报机关提前一个月汇报了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新方针’和外交部特别代表与广州政府谈判的预定使命。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有，英国政府与麦克唐纳进行了一笔交易，致使工党领袖放弃抵制中国问题。去年 12 月初，即麦克唐纳发表相应声明一个月前，伦敦特工机关方面向总部报告了此事。”

在评价反间谍情报时，克拉斯纳娅指出，情报“内容非常广泛”。她在报告中说：“平均每月收到 50 份反间谍材料，这些材料来自一名党员情报员，他在财政部和苏格兰场有消息来源。这

些材料相当真实。我们的情报员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从警察局档案中撤出了许多败坏党的声誉的材料。比如，1925年秋天，共产党中央遭到搜查后，他们确实销毁了最重要的材料，因此，1926年春天内政部发表的《蓝皮书》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书里实际上没有任何秘密材料。”

克拉斯纳娅在总结伦敦特工机关的情报活动时写道：“总的来说，我们从伦敦获得的外交情报以月情通报或周情通报的形式上报内务人民委员部，有选择地上报给雷科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有时（很少）上报情报总局。我们的通报受到积极的评价。

“反间谍材料上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情报总局。在多数情况下，某些情报活动的最后结果多数情况下难以得到评估，但它们起了预先警告的作用，而且是极有价值的作用（比如，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情报总局工作人员受到监视的情报）。情报总局认为，有关印度的材料相当重要。

“伦敦特工机关获取的经济情报只有一小部分成为外贸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财富。它们主要提供给经济管理局，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情报内容粗浅。”

叶连娜·克拉斯纳娅指出，伦敦特工机关除了缺少文件材料以外，针对所谓“白军系统”方面的情报工作做得也不够，具体是缺少训练有素的人才。她写道：“但是，这方面的条件是具备的。巴格拉图尼将军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他是克伦斯基的前参谋长，沙皇司令部前情报处长助理，还保留着老关系，并让自己的妻子投靠德特丁勋爵。他不会拒绝投靠我们，但没有人同他谈这件事，可他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从德特丁夫人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同她相识不难，而认识她会有很多好处。有机会败坏前白军领事奥努的名声从而招募他。他同样保留着老关系，现在帮助萨布林替苏格兰场收集俄英贸易股份公司和苏联驻伦敦其

他经济机构的情报。”

克拉斯纳娅认为，在获取政治情报方面，伦敦特工机关也有不错的前景：“从其他特工机关的情报及各种文件材料来判断，如果在伦敦设立特工机关，或者最好在秘密机构中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在意大利、法国、立陶宛、波兰和阿富汗大使馆及英国对华利益协会（它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咨询机构和英国远东政策的执行者）获得情报员。”

在伦敦特工机关情报员名单中，叶连娜·克拉斯纳娅漏掉了B—13 尽管据当时的情报材料证明，他的消息一直来自伦敦。他就是总参少将，沙皇陛下在法国北部的军事代表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季亚科诺夫。

军人世家出身的季亚科诺夫 1905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参加过俄日战争，因精通几门欧洲国家语言，很快就调到军事外交部门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被派到伦敦当助理武官。战争伊始，季亚科诺夫作为俄国军事观察团成员，应召前往法德前线作战。他指挥过第 2 特种团，因战功显赫，被授予多枚法国军队十字勋章并获得了一枚荣誉团勋章。尼古拉二世提拔他为将军。1917 年 9 月，季亚科诺夫再次被派往伦敦，当上了武官。1920 年，他在完成俄国军事使命后来到了巴黎，被当地白俄上流社会所接纳。

1924 年是季亚科诺夫的生命转折点。他厌恶白俄组织领导层的内讧和巴结讨好各国政府，出于爱国觉悟，决定为祖国——苏联效力，并于当年 3 月份致信苏联驻伦敦临时代办，申请加入苏联国籍，请求根据他的主要专长——军事代表来使用他。因为没有得到答复，一个月后，他又寄出第二封信，提醒注意他的请求。这一次，苏联情报机关同他取得了联系，告诉他，如果他在基里尔大公（他的支持者称他为“陛下”和“国君”）周围的人

中继续保持较高地位，所作的贡献将大得多。他同意了，这成为他与苏联情报机关 17 年合作的开端。

20 年代，苏联政府认为，苏联的主要危险是白俄借助于外国力量所进行的军事干涉，他们有一批训练有素，经过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锻炼的军官。季亚科诺夫正好处在制定这种行动计划的核心。因为他是基里尔大公秘密和最微妙的嘱托的执行人之一，所以他的情报完全符合侦察机关获取白俄意图情报的要求。

1925 年 6 月 19 日，季亚科诺夫在书面报告中说，6 月 17 日晚，基里尔大公主持召开了会议，商讨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组建几支由“帝国陆海军团”官兵组成的军队的问题。除季亚科诺夫本人外，参加这次会议的人还有中将洛赫维茨基、中将希林戈、少将阿利扬奇科夫、海军少将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上校奥斯滕·萨肯伯爵和上校科兹利亚尼科夫。

基里尔在开场白中表示，“军团”官兵人数实在太多，以至于需要刻不容缓地组建明确的军事组织。他说，俄国事态发展迅猛，条件逐渐成熟，随时都会需要帝国军队对苏联政府采取积极行动。然而，这些行动的主要障碍是缺少必要的资金，因为至今还没有得到美国提供的资金，并且根本无法预测何时收到这笔资金。基里尔说，另一个难题是没有组建部队的领土，但现在正与某个大国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有一切理由相信，谈判将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成功。会议决定，向已找到的地区派遣官兵，着手准备战斗行动，收到钱后立即购买装备，并将其存放在这个地区。

会议结束后，奥斯滕·萨肯伯爵把季亚科诺夫叫到一边，告诉他也：“国君命令季亚科诺夫次日到他那里商谈一件重要事情。”6 月 18 日，季亚科诺夫来到基里尔那里，奥斯滕·萨肯伯爵也在场。基里尔谈道：